

后现代文化与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

——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

张一兵

内容提要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后现代实际上是资本的帝国统治的客观状态，作为激进话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思潮恰恰映射了现实中资本帝国统治方式的深刻变化，反基础论和流动的多样性认知模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化布展的存在特征。所以，如果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鼓吹的碎片化的主体和混杂的主权形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布展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看起来革命的话语恰恰在无意识中成为帝国统治的观念同谋。这是一种需要批判性审视的观点。

关键词 奈格里；哈特；《帝国》；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资本帝国

出版于2001年的《帝国》^①已经是一本老书，它的作者奈格里和哈特如今也都已经是当红的左翼批判理论家。在这本书中，奈格里和哈特提出，面对资本主义从可见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转变为不可见的帝国，我们首先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全新的思想武装。而在世纪之交，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学思潮自指为一种激进话语，正弥漫于整个欧美学界。与流行的观点不同，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与其表面的激进恰好相反，后现代文化本质上是资本帝国的无意识主观映射。所以，我们今天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批判性地透视观念层面上与帝国同质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后现代文化恰恰映射了现实中资本帝国统治方式的深刻变化，反基础论和流动的多样性认知模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化布展的存在特征。于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恰恰是帝国布展的同谋性观念形态，这一点在文学理论讨论域中也并不例外。显然，这是一个激进的批判性翻转。对此，我们应该批判性地予以审视并深入省思。

一 后现代文化思潮与资本帝国的无意识同谋

面对全新的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奈格里和哈特提出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寻求新的支撑。

他们先是引述了阿尔都塞在晚年写下的一篇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文本^②。在这一文献中，阿尔都塞建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将理论引到实践”，应该在现实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结构中，重新“建立起主体的内在性行为，由此构筑起存在的新位置”^③。这是两个法国理论的追随者对阿尔都塞的致敬。转换到今天的帝国时代，“将理论引到实践”，也就是要清醒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中发生的新变化和内在矛盾：

从生命政治的角度看，后现代情境（postmodern situation）具有显著的自我矛盾特征，被理解为不间断的生活回路、生产回路、政治回路（circuit of life, production, and politics），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一切力量都被激发为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另一方面，同样的力量又受制于全球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日益趋于抽象，从而，生活再生产中的装置感（sense of the apparatuses）越发成为盲区。^④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透视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是我界定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质性尺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分析中，奈格里和哈特基本上坚持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话语和原则，即后工业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决定了后现代的生活和文化情境。所以，在他们的眼里，先是从资本帝国的后工业生产方式中发现了传统工业资本统治关系的不间断的软化，以及后工业生产的弥漫性回路特征，这甚至是所谓后现代生活、文化思潮和政治存在的根本特征。更重要的是，网络信息化存在的资本帝国用以统治世界的再生产装置却是不可见的盲区。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走向新的替代方案（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似乎被消除了，资产阶级欢呼全面胜利的“历史的终结”（福山）被有效地施加于世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好像就成为了天然的自然构序，在这样的框架中，生命政治恰恰是作为行政和管理的科学方式而被去意识形态化，帝国的权力控制失去其透明性，在与科学技术同体的规训化与法制化中，权力隐蔽自身，其背后发生的真相却是，“人类的一切力量又被召唤起以作贡献于劳动力、社会和生活的全球再生产”^⑤，当然，这是资本帝国的全球再生产。奈格里和哈特的这一分析是深刻而具有透视感的，他们认为革命者急需回答的新问题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才能再激励起革命政治话语？它如何才能获得新的连贯性，如何才能为最终的宣言注入新的唯物主义目的论（new materialist teleology）？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将主体（诸众）和客体（世界解放）融合于后现代性之中？”^⑥这是一连串追问中呈现的复杂思想点，后现代性是激进话语中对时代的断代定性，何为新的革命主体？何为新的解放的客观可能性？何为新唯物主义的革命宣言？这是在宣示本书的要旨。

奈格里和哈特说，这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统治，伴随着一种看起来激进和革命的理论观点，即后现代文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postmodernist and postcolonialist theorists）”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论革命，在各种各样的“后—”（post-）的旗号下，“它们不知疲倦地批判旧的统治形式，以及旧形式在现在的遗留，从中寻求解放”^⑦。有趣的是，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思潮被从文学评论领域介绍到中国学界时的激进话语身份定位，这种误认至今可能仍是文学评论语境中的共识。甚至，“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内，后现代主义思想被奉为迎接学术和智力实践新范式的一声

号角，它也被视为挑战各个学术领域内的支配范式的机遇”^⑧，比如在哲学、文学和历史领域。然而，奈格里和哈特的判断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媒体和媒体制造的文化告诉我们：这批哲学家认识到了世界的新时代的来临。可真相并非如此”^⑨，后现代理论并不是像它们看起来那样的激进和革命，在一定的意义上，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恰恰是反革命的！有趣的是，在1988年前后，奈格里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拥护后现代”^⑩，当然，那是在讨论文学艺术的特定构境中。奈格里和哈特告诉我们，从本质上看，后现代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中的批判对象”，一句话，它们看起来激进，但可惜“它们认错了敌人”。为什么？

这些理论的批评家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modern form of power），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了，怎么办？这些理论家们如此倾注于同旧支配形式的残余作斗争，可假如他们因此而未能认识到现在正浮现于他们眼前的新支配形式，怎么办？假如原本作为批判对象的支配力量已经历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抽去了后现代论的（postmodernist）挑战的潜能，又怎么办？^⑪

这一系列问题是尖锐和深刻的，恐怕也是那些鼓吹后现代理论的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具体而言，后现代理论主要是在批判和反对现代性的权力中心，而以碎片化、非中心论的姿态来标榜一种新的革命激进，但问题是，如果今天统治世界的资本力量已经不再是以现代性的权力方式发生作用，而后现代所突显的革命和激进的姿态就是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布展方式，那么，后现代理论还会保持住自己的挑战性潜能和张力吗？具体到文学领域，如果一种作品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正好符合了后现代资本逻辑在今天的布展特征，那么，这种文学到底是反抗还是同谋呢？奈格里和哈特在反讽的构境中进一步追问道：“假如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postmodern sovereignty）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向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hybrid and fragmentary subjectivities）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论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该怎么办？”^⑫这就

是说，如果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鼓吹的碎片化的主体和混杂的主权形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布展的存在方式，这种看起来革命的话语恰恰在无意识中成为帝国统治的观念同谋，虽然这可能是无意识和倒错式发生的事件。奈格里和哈特明确表示，不同意德里克等人将后现代理论简单地视作“全球资本主义雇养的智者”或“全球资本和世界市场的走狗”的观点¹³，因为至少从主观上后现代理论家们还自以为在攻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看上去具有解放性的后现代论、后殖民论策略已不再是挑战，而成了新统治策略的实际同属，甚至不自知地强化了新的统治策略。”¹⁴此处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文学评论家斯皮瓦克也是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奈格里和哈特这里的批判性质疑，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本质最深刻的理论分析，也是杰姆逊“后现代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断言的具体确证。

有意思的是，熟悉法国生活和思想界情况的奈格里和哈特还细致地解释了这一思潮的历史缘起。他们说，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发明者是一群“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被他们点到的有利奥塔“对现代性控制叙述的批判”、鲍德里亚“对文化拟像的肯定”，以及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基本上是对的，但奈格里和哈特没有注意到德里达在1992年《马克思的幽灵》中开始向左转¹⁵。而且奈格里和哈特显然故意没有提及德勒兹，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核心学术生产者。在更深的学术缘起的构境层中，还应该包括拉康、后期巴特和福柯¹⁶。

这个分析基本上是准确的。法国后现代理论的制造者，多是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在红色五月风暴的挫败中，选择了转向背离马克思主义，而鼓吹一种玩世不恭的后现代文化，讥讽反抗资本主义的一切宏大叙事。不过这一蜕变过程要比奈格里和哈特描述的更复杂一些。

二 帝国经济政治布展中的后现代文化

当然，奈格里和哈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整个后现代文化思潮，而是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与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同体发展起来的资本帝国的隐性观念构境。在他们看来，后现代思潮所鼓吹的

碎片化和去中心论是资本的帝国统治的客观状态。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说后现代就意味着，“资本的敌对关系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生命的所有节点，不管是生产、文化，还是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周围的世界现在以生命政治为特征”¹⁷。后现代等于生命政治。当然，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已经不是福柯的生命政治。

首先，资本帝国对差异性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具有免疫力。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后现代文化思潮力推“建立在个性差别、流动性和混杂性上的政治学”，以此来挑战资产阶级现代性所持有的“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似乎今天面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通过一种与“原质同一性、二元分裂和稳定性”决裂，造成一个对“混合性和差异在分界间的自由游戏的肯定才具有解放作用”。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一点并不错。因为“现代主权的世界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它分裂为一系列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白人和黑人、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现代主义思想所挑战的正是现代性的二分逻辑，它为那些同父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斗争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¹⁸。这个描述基本上是精准的，这的确是从德里达反对基础和中心的解构理论到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判的发展路径。可是，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后现代思潮、后殖民文学理论在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而今天的资本主义统治在从工业现代性转换到后工业的帝国全球网络信息存在后，对后现代理论所鼓吹的差异性政治已具有完全的“免疫力”（immune），所以，后现代政治理论中的差异性政治观，“只是在将刀剑挥向旧敌人的影子”。这就是说，后现代理论家们没有发现的真相是，当后现代的资本帝国的“权力已经把受到攻击的堡垒疏散，还绕到进攻者的背后，同他们汇合到一起，以个性差别之名发起攻击。所以，这些理论家发现自己就像是在推一扇并不存在的门”¹⁹。这似乎是一个颠倒的观念辩证法：后现代思潮和后殖民文学理论是在与风车作战，并且与其在同一个战壕中的却是自己幻想中没有注意到的真正的敌人。“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最美好的意愿，可他们的差异性政治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更有可能同帝国统治沦为同路，成为其功能和实践的支持者。”²⁰我基本同意奈格里

和哈特对后现代理论的上述批判,但我的疑问是,这个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差异政治学的最大代表人物,就是德勒兹,而此人又被奈格里和哈特尊为方法论的前提,这算不算一个故意为之的逻辑“放水”?我还注意到,奈格里曾经将狄尔泰和福柯指认为走向后现代和“生命政治”的“之前”和“之后”^{②1},可这种作为后现代思想先驱的定位与此处的批判构境的关联如何,可能也是一个没有说明的深层次问题。

其次,帝国全球化市场意识形态中包含反基础、反本质主义话语。奈格里和哈特说,在后现代理论中,还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口号就是反对一切基质,拒绝本质主义,可是他们恰恰没有想到,这种观点却正是资本帝国在现实经济和社会全球化中的最新表现。在今天——

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一直就是出色的反基础论、反本质主义话语。流通、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一直就是它的可能条件。贸易把各种差异聚拢到一块,而且越多越好。在世界市场中,差异(商品的、人口的、文化的,等等)似乎在无限繁生,而最沉重的打击就给予了固定分界:随着差异的无限多样性,它淹没了任何二元划分。^{②2}

今天资本帝国生存的世界市场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反基础、反本质的方式消解了一切领域性的主权、一切旧有的物理空间和时间,全球布展中的网络信息化资本流动和多样性的国际劳动分工,消除了任何固定边界的障碍。这样,传统现代性中依存于一定边界之中的商品、人口和文化都统统脱离了自身的基础,以无限多样的方式臣服于资本帝国的支配。当后现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以碎片化和无深度的方面呈现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们仅仅是真实地映照了资本逻辑的最新塑形。在全新的资本帝国统治中,“随着国家边界的消隐,世界经济从民族国家施加的二元划分中挣脱出来,在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无数差异。当然,这些差异并没有在平滑的全球空间里自由游戏,而是被控制在由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highly differentiated and mobile structures)构成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②3}。这是说,脱离一定的基础后生成的差异性空间,恰恰是帝国权力布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也意味着后现代文化思潮

中看似激进的非本质主义话语,正是今天资本帝国盘剥剩余价值和生命政治统治的法宝。所以,奈格里和哈特干脆说:“后现代论思维及它的核心概念会盛行于标准的资本理论和资本实践领域中(如,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生产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后现代主义简直就成了全球资本运营的逻辑。”^{②4}后现代文化的核心思维方式正是帝国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商品销售的运营逻辑,这是继杰姆逊对后现代理论的文化性质宣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的又一重罪宣判。

最后,后现代帝国经济与文化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结构。在后现代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新质是它反对现代性中的线性结构和固定框架,而主张后现代思维的非线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在今天的资本帝国运转中,第一,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本身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特征,“资本的生产过程所采取的形式也在回响着后现代主义者的声音。我们将有充裕的空间分析生产如何在具有流动性和混成性的网络中被组织起来”^{②5}。其实,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流动性本质,是马克思已经指认过的东西,只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运行中,这种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成为了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后现代文化与这种社会存在的新变化是同质的。第二,帝国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国际化多样性分配和流动性控制就更是如此。因为打破了民族国家主权对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控制,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常常是以30万公里/秒的速度)和劳动的国际化分工,造成了资本帝国以一种流动性的控制模式统治全球。第三,甚至跨国公司的文化就是非线性的多样兼容和流动性。

只要仔细审视一下美国的公司意识形态(corporate ideology),就可以发现各公司并不依靠简单地对性别和/或种族他者的排斥来运行。实际上,旧的现代主义式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已成为新公司文化的公开敌人。各公司力求容纳差异,从而在公司的工作空间内最大化地实现创新、自由和多样性。具有不同性别、种族和性倾向的人都应被容纳进来,工作空间中单调重复的每日工作程序应被预想不到的改变和欢乐氛围所改造^{②6}。

在跨国公司的实际运作和发展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劳动者，正是在多样性和流动性的文化兼容中被组织和真实吸纳进资本帝国的全球化网络结构，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和不同性取向的劳动者，在一个“实现创新、自由和多样性”的兼容文化中，开心地臣服于资本的实质吸纳。这就意味着，后现代文化本身就是帝国全球统治的文化特征。这真是事与愿违啊。也是在这里，奈格里和哈特提及了大卫·哈维和杰姆逊在批判和研究后现代文学和空间理论的理论贡献^②。

三 资本帝国的后现代存在构序

如果看起来激进的后现代思潮、后殖民文学理论被认为资本帝国现实布展的无意识同谋，资本帝国的本质就是后现代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一定会是，我们如何真实地认识帝国后现代存在的真相。可以看到，关于这一问题，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一书中做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努力。我们先来看一看后现代（工业）进程中发生的主客体存在状态的改变，然后再来观察帝国布展的格局。

首先，客观存在的外部与内部界限消解。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要认清资本帝国存在的基本状态，就必须认识到传统现代性存在论中的外部与内部界限的消失。“内部和外界的空间构形（configuration）是现代思想中一个较普遍也较具基础性的特征，在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中，内部和外界间的区分正越来越模糊”^③。这是一个哲学存在论上的判断。所以，也是前提性的认知条件。第一，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让自然从外部存在变成人的内部存在的过程，那么，后现代中，一切存在都已经不再是外部存在了，“在后现代世界中，一切力量和现象都是人工的，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历史的一部分”^④。这即是说，原来在现代性中的外部自然存在在今天的后现代中已经变成了内部的人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并不准确的判断。因为，在历史的实践中将外部自然转换成人工物质系统的进程并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而是整个工业生产开启的。与农耕文明中的生产只是自然存在的辅助性改变不同，工业生产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劳动塑形

于自然物质，以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物质存在系统的过程。主体世界的内部与外部自然存在的边界恰恰是由现代性工业打破的。后工业存在中的外部与内部边界的消失只是现代性的历史结果。第二，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公众空间构成了自由政治的领域，可在后现代世界中，这种公众空间也正逐步趋于消失”。这是一个从一般存在论到政治生活状态的跳跃。这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化的进程中，原来资产阶级政治所标榜的外部的公众自由空间也正变得越来越私人内部化了，“公共空间的私人化程度已如此之高，以至于再用私人与公众、内部与外界间的辩证关系来理解社会组织已毫无意义了”^⑤。这一描述似乎有些表面和空泛。如果还原到今天的网络信息化生存中，这可以是一个倒置的叙述，实际在后现代文化中发生的事情，是私人空间的公共化，有如今遍地开花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网络大V反倒是通过个人虚拟的“圈粉”政治来建构对公众的影响力。面对无限制的、繁杂网民受众的“外部”网络文学，已经打碎了专业文学创作的神圣内部边界。第三，换成德波的“景观的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的话语，一切可见的现象如果都是由景观建构起来的“虚拟的场所”（virtual place），而“景观社会同时具有统一性和弥散性两种性质，以至于无法区分出孰为其内部，孰为其外界”^⑥。这一跳跃又突然转换到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构境中来了。实际上，这一观念挪用是极其牵强和不准确的。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景观社会》一书中，德波第一次将马克思曾经面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现实，抽离为一种分裂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总体视觉图景，而马克思所指认的市场交换中已经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的人与人的劳动关系，再一次被虚化为一种商业性影像表象中呈现的伪欲望引导结构。这就是社会景观现象。德波对景观拜物教的批判并非是非内外关系的转换，而是实在与幻象的关系颠倒^⑦。在这一点上，奈格里和哈特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这些内部与外部边界的后现代消解正是帝国全球布展的需要。其实，马克思早就指认过，资本总是流向可以产生高额利润的地方，这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

前提条件,只是过去的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与结构化配置还受到民族国家的限制,而在信息网络化的资本帝国时代,似乎一切边界都被跨国公司的经济全球布展打破,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再能限制帝国的无形权力渗透。虽然奈格里和哈特在上面关于外部与内部边界的讨论显得有些牵强和不准确,但他们试图证明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走向是正确的。这与上述后现代思潮无意识地依存于帝国存在构型的虚假激进,可以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无确定性的主体生产和败落。这也是一种哲学存在论上的判断,只是思考的视角从客体向度转向了主体向度,现在奈格里和哈特要告诉我们帝国时代的主体生产的变化。他们认为,传统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已经开始将“主体性的生产建立在主要社会制度的功能中,这些制度包括监狱、家庭、工厂、学校等”。这种主体生产的社会建构有两个方面:第一,“主体性生产是一个恒常的社会生成过程(social process of generation)。当你的老板在楼梯上向你打招呼,或一所高中的校长在学校走廊里向你打招呼时,一种主体性就形成了。在具体制度环境中,为主体所展开的物质践行(material practices)就构成了主体性的生产过程”^⑤。这显然是挪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质询建构说。1969年,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认个人主体是由意识形态大他者在一种每时每刻发生的质询关系和物质践行重复中建构起来的^⑥。第二,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社会制度建构主体,为这种生产的实施设定了“具体的地点”(discrete place),如幼儿教育的家庭、宗教教化的教堂、通识教育的学校教室,等等。所以,“在人的一生中,个人穿入,再穿出这些制度(从学校到兵营再到工厂),被它们打造成形。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具有基础意义。每一种制度都有着自已的一套规则和主体化逻辑(rules and logics of subjectivation)”^⑦。家庭、教育与宗教成为意识形态主体生产的重要践行方式,这也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的观点。可是,在帝国出现的后现代进程中,原先“曾在过去界定各种制度的有限空间的封闭边界已崩溃,从而令原先主要在各制度的高墙之内发挥作用的

逻辑现在已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内部在外界已变得难以区分”^⑧。由此,在帝国的全球布展中,主体性的生产正越来越趋向于不受任何具体地点的限制,“生产地点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于生产出的主体性在形式上的不确定性。这样,帝国的社会制度可被视为处于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衰败(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of subjectivity)构成的流动过程中”^⑨。这里的意思大概是,与传统现代性主体生产与建构的具体地点和固定的机构不同,后现代主体的生产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地点的流动性的建构过程。其实,奈格里和哈特在后现代主体的生成问题上的认识还是表面和肤浅的,在已经发生的网络信息化主体生存的现实,中,显得抽象而空洞。因为在维利里奥和斯蒂格勒的研究中,远程登录的主体性在场已经达及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构境。在《解放的速度》^⑩一书中,维利里奥已经讨论了网络信息化存在中主体的远程在场和相聚问题。而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2卷^⑪中也研究了电子主体的远程登录。

最后,剥削对象和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在奈格里和哈特这里,上述内外关系和主体建构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剥削对象和剥削关系的改变。这种突然从哲学讨论跳跃进具体的政治学批判构境中的做法到底是故意制造的断裂感,还是理论论述的任意,我们无从考证。一是剥削领域的泛化,传统现代性的资本盘剥开始渗透到人的全部生活。这又有两个构序层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关系也完全浸透于生产关系中,已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再区分开”。这两个观点为之后他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升级”留下了伏笔,因为他们将要讨论不发生在工厂中的非物质劳动的剩余价值问题。二是剥削对象的改变,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工人,而扩展到社会的所有层面中的劳动者。

按照奈格里和哈特的说法,资本帝国的剥削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所锁定的物质生产过程的生产性劳动,而包括了一切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抽象劳动”。这个抽象劳动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相对应的那个生成价值的

抽象劳动，而是在“非物质劳动”的构序中重新构境的抽象劳动。这里的抽象更多地是指劳动的非物质性、服务性和情感性特征。奈格里和哈特甚至认为，马克思原来所依据的那个“使用价值界定的内部和由交换价值界定的外部已无处可寻”，这会使得原有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后现代社会中发生根本性的危机。这样，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目标和方式也一定会发生大的转变。

当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消失，主体的建构变得不再确定，资本的剥削结构发生改变，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和控制则获得了全新的后现代条件。依奈格里和哈特的看法，帝国控制全球的进程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包容（inclusive），紧随其后是差异（differential），最后是治理（managerial）。”^⑩显而易见，帝国统治的这三个新的特征与后现代思潮、后殖民文学理论所标榜的东西是同质同构的。

在第一个包容性阶段中，一切民族和生存都被迫进入帝国的无形疆界之内，“不管他们的种族为何、教育为何、肤色为何、性别如何、性倾向如何”，帝国可以对一切差异视而不见，从而达到了“普遍包容”。这恰恰是资本帝国进行无形统治的前提。

产生于包容性、中性、无差别性（inclusionary neutral indifference）的法则就是一种普遍基础，因为它同时应用于在帝国的规则下所有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主体。故而，在这第一阶段，帝国就是一部普遍整合（universal integration）的机器。^⑪

这一点容易理解。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差异性，跨国公司的资本会吸纳一切可能的劳动者进入新的经济整合机器，也会兼并一切可能的资本要素和廉价生产资源。

在第二个差异性的阶段，帝国开始“对被接纳的不同的肯定”，它的包容正是因为这种后现代式的对差异性的接纳和肯定。差异性正是德勒兹所突显的后现代特征。之后，就会出现“对这些差异的治理和等级分化”（management and hierarchization）的第三阶段控制。在奈格里和哈特这里，帝国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尤其重要的关键时期。“偶然性、流动性和灵活性（contingency, mobility, and flexibility）恰恰是帝国力量之所在。

帝国的答案并不是否定或淡化差异，而是肯定它们，在有效的控制系统中安排它们。”^⑫资本帝国的经济和政治运行中的偶然性、流动性和灵活性，无不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所肯定的拒斥现代性中必然性、静止性和凝固性的法宝。

当然，在奈格里和哈特眼里，身处后现代的资本帝国也存在根本性的弱点，用他们的表述即是帝国存在中不断发生的危机和本质上的败落（corruption）。

这也就是说，资本帝国全球布展的灵活和包容的优势同时也就是它的致命弱点，无中心、差异化的存在必然导致其内部的自身矛盾无处不在、激烈的冲突不像现代性资本主义那样往往集中于一两个重点上，帝国内部的冲突表现为游移不定和无法确定，所以，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帝国的危机和败落是基始性和本质性的。然而一定要注意，这里的败落并非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就是资本帝国自己新的后现代本体论的出场方式。它的在场正是以缺席的方式发生的。在《解放的速度》一书中，维利里奥曾经比较深入地讨论过这种由于网络信息化远程登录的即时在场对在场的在此性的直接破坏^⑬。所以奈格里和哈特说：

帝国的权力正是建立在对一切确定的本体论关系（determinate ontological relationship）的破坏和分裂之上。败落正是本体论的缺席的简单标识（corruption is simply the sign of the absence of any ontology）。^⑭在本体论的真空中，败落成为客观和必然。败落引起了矛盾的扩散，在此之上，帝国主权滋蔓成长，稳定帝国的恰恰是它的不稳定和纯净，而抚慰帝国的正是它所引发的焦虑和惊慌。永久的更改和变形、反基础论的基础（anti-foundational foundation）、去本体式的存在模式（deontological mode of being），这一切因败落而得到正名。^⑮

这一断言又回到了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即后现代文化思潮与帝国存在的本体论关系（ontological relationship）。这里的ontology的确不能按照海德格尔的重构译作存在论，它真的就是在旧的基始性本原意义上的“本体论”。帝国的全球布展是在一种传统本体论的真空中发生的，它无国界、无种族、无地域、无时间，帝国的权力可以突破一切阻碍布展到全球，资本帝国存在的方式就是

